

綜合討論（一）



甯應斌（主持人）：我們這場是自由討論，其實也就是把大家從今天早上到現在互相激盪所想到的問題拿出來談。過去會議往往一天之內會排上七、八篇論文發表，時間很緊，也沒法好好消化，今天我們只有四位講者，每位講者都可以花比較多時間來分享他們的體認，也進行了相當的討論，可是發現時間還是不太多，帶出來很多很多的問題和有意思的面向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尤其是我們來自不同的三個社會，雖然都是華人社會，可是又都處於相當不同的境況。

比如說早上吳敏倫提到他們香港性學會不參與遊行示威，基本上有點類似我們台灣社運不參與藍綠示威遊行；可是他的意思還不只如此，包括同性戀遊行，他們團體也是不會去的。當然這是每個地方的政治文化、知識文化的差異，但是事實上，吳敏倫在他的處境裡也有他的道理跟考量。反過來講，如果我們在台灣有這樣的一個知識團體，平常是談論同志權益的倡議團體，如果它不去參與同志街頭運動，我覺得這在台灣就會被質疑它的可信度或正當性，這表現了台灣社會在知識專業自主空間方面的差異。當然也有些相同的地方，比如說我們都經歷過與女性主義論戰的階段，但是這方面我們今天談的不是很多，潘綏銘在這方面講得不多，或許不想講吧？

潘綏銘：人家根本就不理我。

甯應斌（主持人）：好，這個部分在知識上也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我們不是怕人家挑戰，

更不怕別人批判，我們非常希望有對話，這樣可以加深社會內部彼此的認知和認識，不是說我們就對，對方就一定錯，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能發掘一些更深層的問題。

我們現在可以看出來，中國大陸很重要的一個關懷是民間與國家的關係，這好像和我們台灣在解嚴以前國家與民間社會之間有種官民對立的氣氛類似，也就是有一個所謂公民社會和國家對抗的氛圍和知識框架，這樣的框架其實存在著陷阱，因為它把性少數之類的邊緣都裹脅挾持到「民間」或「公民社會」的一體化陣營內，因而泯滅或擱置了民間社會陣營內的壓迫關係。但是過去台灣與當前大陸也有不那麼相同的地方，萬延海今天就提到說中共國家旁邊有一些人，有些在體制內，有些在體制外，這之中有些是所謂的左派或者民族主義派，他們一般來說還是跟中共國家走得比較近；至於所謂自由派方面，有一些是在共產黨內主張政治改革的，也有一些則是跟中共國家對抗的，後者還包括了基督教。可是台灣好像情況又不一樣，我們不會想像基督教是跟國家對立的，相反的，我們知道他們某種程度上是蠻結合國家的。這當然有個歷史（我在《色情無價》這本書的序提過）。

簡單的說：在解嚴以前，比較少看到台灣的保守群眾在公領域裡出現，偶而才在社會轟動議題上出來大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是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有個代理，那個時候的政府維持社會保守風氣，把保守人士的權益都照顧得好好的，但是解嚴以後顯然就亂了腳步，整個保守群眾原來的保守組織——就是依附黨國的組織——全部都瓦解了，這下子就群龍無首

，亂七八糟的。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反而覺得整個台灣社會好像很進步、很自由，沒有太多的管理。接下來就是新一代保守群眾的領導人和領導組織陸續出現，她們是比較了解媒體的，知道怎麼在新型的立法院做公關，更學會了一套社運的手法，成立了我們看到現在的各種各樣NGO，在政治上也非常的投機，起先跟扁政府非常好，扁政府倒台後，她們又能繼續在馬政府裡面生存。所以在台灣，領導保守群眾的基督教是跟國家站在一起的，跟大陸的基督教好像和政府對立很不一樣。

至於自由主義，我們在台灣政治中好像沒有看到什麼真正的自由主義。國民黨當政的時候，反對它的民進黨好像每個人都是自由主義鬥士；但是當民進黨當政的時候，每個國民黨的反對派都變成了自由主義者。大家都用一些自由主義的理念和說法去質疑當權者，但是自己掌權後又將自由主義踩在腳底。相較而言，和台灣整個國家或者這些保守團體站在對立面的，反而是有點像中國大陸左派的一些左翼激進運動者，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錯位，可是台灣大陸又不太一樣。因為我覺得中國大陸的運動由於時間發展上是後發的，所以在現在這個階段應該有後見之明；例如大陸同性戀運動起步不久，就已經有了酷兒思潮。很多思潮與觀念在別的社會是經過發展與鬥爭逐漸產生的，所以時間上會有階段性，有先後之分，但是由於全球化的知識思潮進口，所有的東西都在同一個時間抵達了大陸，這就把整個狀況都搞得很詭譎。

像黃道明今天對開明進步的愛滋運動之批判，我覺得固然大陸的朋友可能不是那麼容易進

入狀況（潘綏銘：還好，大陸差不多），但是我感覺台灣有些人也不是那麼容易進入黃道明的觀念。當然我們會議上的群眾比較特殊一點，可能比較能夠欣賞黃的論點，但是我想即使是在台灣同志運動裡面，黃道明的論點也不是一種主流的想法，事實上是對於同志主流化運動的一個批判。這也凸顯了一點：就中國大陸的官民對抗來說，好像所有的民間都還是抱在一起的、都是朋友，但是從台灣經驗來講，現在跟你站在同一戰線的朋友很可能就是你下一階段真正致命的敵人，至少我們在台灣的經驗是這樣子。所以我個人覺得，當「公共知識分子」在談政治自由、言論自由的時候，我們不能只是說「對，這個政治言論自由是我們要的」；我覺得必須要把色情的言論自由同時抬出來，放在檯面上讓公眾吃下去，不能說「沒關係，等到中共政權倒台了以後，每個人都有政治言論自由以後，在下一個階段就會有色情言論自由」。我們在台灣的經驗不是這樣子的，我們在解嚴以後混亂的、沒有管制的狀況中曾經一度享受過的那些色情自由，反而在接下來的歲月中一步一步地喪失了，最後形成的這個體制和社會卻反而被認為是越來越自由的、十分正當的。回顧這樣的一個過程可以幫助大家見微知著。

好，我利用主持人的特權發表了我一點點的想法，以下討論不限於我講的這條線，因為這只是我個人的關懷，好不好？所以現在開放，台上的人先講也行，台下的提問也可以。

吳敏倫：中午休息的時候甯應斌跟我說，覺得我的立場——不參加示威遊行——有些問題。讓我解釋多一點吧。首先，我覺得每個運動就像打一場戰爭一樣，有人在前線、有人是戰爭

的顧問、有人是總司令，每個人有他的特長、特點，不可以讓總司令或者顧問走上前線，因為示威的人是前線的人，他們有他們的技術和技巧去做示威，我們這些手無縛雞的人走去喊口號什麼的，要怎麼走，拿什麼牌子，我們沒有他們做得這麼好，有些時候會讓他們照顧我們也說不定。所以第一點是，我們這些學者是否真的參加了遊行就很好？

第二，我們訂定了一個印象：我們是中立的。有的時候團體講的東西不一定都是對的，我們有的時候反對同性戀團體說的話，有些時候贊成。如果今天遊行我贊成他，我就去做他們的啦啦隊，但是第二天他們講了另外一個話，我們認為好像沒有什麼理由、沒有證據，我就去幫政府，我就站在政府那邊罵同性戀。又比如說婦女運動有些婦女分子反對我，但是其實我是贊成她很多其他東西的。所以不可以今天這個團體我贊成，我就參加這個團體的遊行，第二天就參加對方的遊行，那麼這給人家看起來很奇怪，「你這是做什麼的？」你的可信力就被人家懷疑了。

我們是做學問的、做研究的，我們就要用我們自己的形象和能力表現出來，我們是幫裡不幫襯的。所以要發揮影響，你不可以參加這些運動，不可以將你的支持放在一個團體或幾個團體，因為你不知道這個這些團體另外的東西對不對。我們這個中立的立場有一個好處，就是只要有好的理由，政府我也可以支持，你們這個團體我也可以支持，這樣就可能幫兩個敵對的團體有些溝通。我們是中間人，讓他們可以明白這些事，但是我們去參加這個遊行，可能他們永

遠看我就是個敵人，就幫不到忙了。這是我的理由。

潘綏銘：說到同性戀群體與愛滋病預防工作的關係，在大陸也差不多，所以我給大家提供一個訊息，就是在大陸的公共衛生領域、疾病預防中心已經有一種意見正在逐漸的上升，他們認為我們支持這麼多的同性戀組織，結果同性戀透過這些組織互相交朋友、搞群交什麼等等，擴大了性亂，這是他們一年前提出的說法，現在還占少數，但是正在慢慢地上升。所以我提供一個信息。

許雅斐：我想要指出來，我們的行政部門其實已經可以不用經過公開辯論，可以迴避立法過程，而可以針對這些性邊緣、性少數為所欲為。這跟過去是不同的，過去我們不管是針對所謂的性交易或者針對其他的性少數群體，其實都是透過立法過程才能擴大它的政策基礎，才能夠取得預算，政府部門才能所謂的依法行政。但是現在我們的政府已經可以迴避這些，而且我們的NGO不但以所謂公民的志願順服作為基礎，它也有辦法導致我們的愛滋防治政策再生產乃至於不斷的擴大它的政策基礎。

王蘋剛也問了一個問題：政府這麼大動作希望或者要求全民進行篩檢，它的政策目的到底要幹什麼？同樣的這個問題，二〇一〇年的一月初，我在跟國內同志運動一位重要人物面對面訪談的時候，他就有當面跟我提出這一點。他跟我提的方式是說：我們的衛生署就是希望管束到底有多少人被篩檢，他們要求這個管束，但是如果真的篩檢結果的反應是陽性，其實政府部

門沒有做任何事，沒有心理輔導、也沒有後續治療。這位受訪者還跟我說，在衛生署疾管局開會的時候，疾管局的副局長當面指著他大罵，因為知道他是同志的身分，指著他對他說：「你是台灣社會的毒瘤！」那我們可以看出這絕對不是一個對同志友善的動作。其實愛滋防治的匿名篩檢，根本不是為了達成任何政策目的，也就是說，這個政策本身就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或者真的是為人民、為同志的政策目的存在，但是卻可以不斷的擴大預算，用「政府部門要做什么」來擴大它的政策基礎，這是我們必須關注的。

何春蕤：我今天聽萬延海講一些事情很有感覺，因為我這幾年也因緣際會有機會在大陸認識一些NGO的朋友，對於NGO在這幾年的大幅發展以及國外資金的進入，大家都有一些感受。那個感受就是，當外國基金或金錢大量進入中國社會的時候，其實是有很多人跳出來做各式各樣的組織和運動。這裡面，基金會本身的資金進來的時候是帶著一些可能的期望，像剛才提到是有些期望要做人權或維權，可是這個人權和維權是「維」什麼「權」？怎麼「維權」？或者要擺出什麼樣跟政府的關係，應該怎麼操作之類的，不知道基金會是不是會有什麼比較明確的指示？因為當民間組織的基金來源是政府的時候，會有一些問題；但是民間組織的錢來自於民間的基金會的時候，而特別是外國基金會的時候，又有另外一些問題。台灣比較沒有這個外國基金會的問題，是因為外國基金會現在基本上只投入中國大陸，不進入台灣，台灣如果有得到外國基金會的資助，通常都是本身宗教團體原初的國際單位。所以像這個資金來自於不同方

向的時候，來自於政府也好，來自於基金會也好，會形成什麼樣的一些不一樣的很具體的壓力？這部分我還蠻希望聽萬延海多談一談的。如果老潘有基金會經驗，也可以談談。

萬延海：這裡面有些差異。有一些國際基金是放在政府那裡管理，由衛生部門的機構來分派；還有一些資金則是由國際基金會直接給中國的民間組織的。基本上來講，中國政府把這種國際的基金會，特別是有民主和人權價值觀的這種基金會，看成是有威脅性的，這樣一來就會很麻煩，一方面，很多民間組織的發展需要國際基金會，我們在拿一些敏感的基金會的錢的時候也會徵求政府的意見，因為政府的人抓過我們，抓過我們之後，他們基本上都會有條件，放出來以後你要經常跟他們談話；他們有時來找你，有的時候要求你找它們，還有的時候你認得了一些政府的官員，有的時候就會諮詢意見。在我們拿一些資金的時候，政府一開始也沒反對，但是就在我們拿了美國民主基金會或索羅斯基金會的錢之後還沒到一年，中亞地區就發生了「顏色革命」¹，顏色革命發生之後，這兩個基金會都被認為是革命幕後的黑手，那麼我們機構就算是接受了兩個被中國政府認為是顏色革命幕後黑手的基金會在中國的支持，這樣的話，

1 編按：「顏色革命」指的是二十世紀末期開始一系列發生在中亞、東歐獨立國協國家，以顏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這些運動有向中東地區蔓延的趨勢。參與者通常通過非暴力手段來抵制獨裁政府，擁護他們所認為的民主、自由以及美式思維方式。他們通常採用特別的顏色或者花朵來作為標誌。目前顏色革命已經在塞爾維亞、喬治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這幾個國家取得成功，推翻了原來的親俄政府，建立了親美的所謂民選政府。

我們也變成它的一個目標，不過後來我們還是持續了很久。這種公民組織有時會牽涉到，一個是基金會本身的敏感性，還有一個是公民運動本身的邊界是不清楚的，比如說律師團體參與很多的事，我們也參與很多各種各樣公民的維權，最後大家都能走到一起去，但是這樣就有人說，你們拿了基金會的錢，然後又跟這些中國共產黨的敵人站在一起，跟共產黨鬥，這樣，政府就要來消滅你，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愛滋病領域的基金在中國帶來的問題可能更複雜。像比爾蓋茲基金會在中國的錢主要在男同性戀群體裡做愛滋病的檢測，就是赤裸裸的拿錢做愛滋病檢測，而且是聲明登記的。我們二〇〇五年在北京的時候試圖在一家醫院開放醫療診所，梅毒的診療費是免費的，愛滋病檢測是免費的，還有一些治療都是減免的。我們要求所有人的身分是匿名的，我們有編碼，結果我們那個中心剛建立起來，衛生部門就拿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的錢到那裏做愛滋病、梅毒的研究，然後所有的人都要登記身分證、家庭住址、工作單位、還有聯繫電話。我們為這個事情跟衛生部門吵了一架，這種架吵多了之後，我們跟衛生部門的關係也就很糟糕。這樣我就面臨了政治上政府不信任我們，因為我們拿了民主基金會的錢，在醫學領域也經常吵架，為的是基本的隱私權。另外還有一些腐敗的問題，都經常跟衛生部門吵架。

外國基金會本身來的壓力是還好，開始還好，沒有什麼特別的壓力，因為那時候很多中國人不敢拿這些基金會的錢，所以基金會能在中國工作，我們能拿他們的錢，對基金會來講也是

求之不得的。但是慢慢地，錢還是好東西，所以很多人覺得民主的錢、人權的錢也可以拿，而且還很多，所以大家都去找基金會要錢。這個時候就會互相的告黑狀，人性的一些弱點就出來，很多人去討好基金會要錢。那基金會的項目官員因為找他的人多了，想法也會變，如果基金會換了新人，來找他說好話的人越來越多，他個性上更自我中心的部分就會更張揚一點。類似這樣的情況，我們在兩年前跟我們的一個基金會產生了一個比較大的衝突，那個時候基金會的人到我辦公室，要求我們不能批評聯合國機構，要接受聯合國和相關議題的意見，還提出一些我們沒接受的要求，威脅要停我們的錢。我就給他們去信說：「錢，我們不要了」，但是不要之後，對我們也很難受，因為我們的攤子已經發展起來了，那麼多工作、人和項目需要資金來支持。當時很多人到美國的基金會去告我們，所以我給相關的基金會都寫信，兩個最大的基金會我都寫信，說錢都不要了，但後來發現也不能不要，後來我們還是要了一個。

但這對我們來講確實是挑戰，民主的基金讓我們變得敏感，但另外一方面，中國確實不民主，我們也確實需要在中國推動民主；但在另一方面，我們這個工作似乎社會性更強一點，這個事情怎麼把握，我覺得我現在也沒想好。

王巖：在愛滋論述上，台灣的「新好健康同志」的說法要求每個人要為自己的私人行為負責任，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純粹道德的論述，應該是個陰謀，是國家治理或國家推卸責任的陰謀，因為它就把責任推到你個人身上。可是我覺得我們好像也可以做些事情，比如說現在已經有

一些有志之士在一些團體裡工作，或者是在官方的資源之下做事情，我覺得好像也不是沒有任何空間做任何事。所以我覺得我們不但不要去推廣這種論述，還應該反過來說，我們確實是一個人，但是我們也應該扛起一些責任，也就是扛起社會責任、扛起政治責任，我們應該讓個人有機會看見政府的政策是什麼，然後政府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在對待感染者，然後台灣目前的防治狀態是什麼。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自己扛起責任來監督政府、監督政策，我們來介入公共對話，我覺得這是可以操作的。

我當然也想問大家，我知道兩岸三地是不同的社會環境、不同的政治結構，我也看見愛滋在中國大陸跟台灣的資源路境在歷史發展中是非常不一樣的，中國大陸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愛滋資源，所以有這麼多的男同志團體，這個同志的榮景是這樣來的。台灣則相反，台灣都是民間自己草根弄，而且以台灣的愛滋防治來說，政府早期根本完全不管的，是台灣民間自己在那邊辛苦慢慢弄起來的。可是現在台灣走到現在開始有官方大筆的資源，比如說北中南都要成立類似的同志中心，剛剛萬延海說的話我應該沒有聽錯，他說：「如果要在中國大陸看到一些比較針對社會那樣一個不民主的狀態，能夠提出一些比較有反省力的批評與意見或是有行動的，這些團體是來自於沒有拿政府愛滋資源的團體」。這對我們來說，我覺得這個對照是還蠻有意義的。我不知道我的問題有沒有夠清楚。

萬延海：在中國大陸的背景下面，愛滋病的議題在男同性戀人群中的發展其實也蠻危險的

。中國政府規定電視台不准放同性戀的電視電影節目，同性戀的書籍出版也是有限制的，廣播電視裡面不能有性的節目，學校也沒這種教育，而整個媒體都是討論同性戀和愛滋病的關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另外一個是，同志社群的人好不容易有個地方，一個同志中心，可以聚會，輕鬆一下，結果一幫衛生部門就跑來提醒大家愛滋病的事情，但是當你發現有愛滋病的時候，政府也不見得對你的隱私和醫療方面有照顧，很多人發現自己有愛滋病就離開了自己的家鄉，中國的醫療是戶籍制的，所以這個人在外地實際上得到的藥物就變得很少。中國的衛生部門對同性戀只關心兩個東西，就是加號還是減號，也就是問測試反應是陽性或者陰性的，在中國政府的檔案裏面關心同性戀的就只有這兩個符號，別的東西它是不關心的。至於這樣拼命測試是否為了得到更多經費？我覺得中國很多部門還是傳統的科學家態度，只是為了寫論文到國際上發表。你看中國國家愛滋病中心就是整天做各種各樣的流動調查，二〇〇七年的一段時間做了一個全國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男同性戀的愛滋病研究，大概做了兩萬多個樣本，持續了約兩年的時間的愛滋病調查。

甯應斌（主持人）：應該沒有基層的單位是沒有拿政府錢吧？因為即使外國的錢也是要透過政府嘛，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對吧？

萬延海：也有不拿外國錢的。

甯應斌（主持人）：那他錢哪裡來？

萬延海：有一些是來自同性戀的基金會，比如說國際的婦女基金會和婦女的同性戀基金會。還有就是我們這個機構其實在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九年之間相當於一個基金會，我們給了很多組織在衛生部門之外的錢，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政府恨我們恨這樣。我們的錢一直是政府沒能管得住。如果政府能管得住我的錢，它一定是不會來消滅我。

與會者：你好，我是 Beyond Gender 的芭比，我們是一個新成立的團體。今天下午的部分比較是屬於愛滋運動的議題，我覺得應該要探討的問題是愛滋病被污名化的問題。比如說剛剛有個同學說，要把愛滋病註記在健保卡上面，其實很多長期慢性病患覺得自己的病被註記在健保卡上沒什麼大不了的，可是為什麼愛滋病被註記在健保卡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為患者知道一旦被註記就會被歧視，這個被歧視是來自於不諒解、不理解，大家對愛滋病是一個有點知道可是又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的狀態。你不理解、害怕，接著就是排斥、歧視。那不理解是來自於哪裡？第一個就是教育，其實這個就要拉到學校的性教育，可能東方人比較保守，老師在課堂講性教育，這不太可能，這方面的知識就相對比較缺乏。第二個問題就來自於媒體，其實我之前有做一些媒體相關的工作，所以知道有些媒體就是惟恐天下不亂，只要看到男同志開趴就把新聞鬧得很大，比如說我剛有稍微研究一下何老師的《動物戀網頁事件簿》，其實這只是某報記者無聊上網去看，剛好有動物戀資訊，就把它弄得很誇張。我覺得性教育和媒體管制這方面應該加強規範，就是把這件事情透明化，就是說清楚「愛滋病就是怎樣」，那我們了解了，至少就

不會去排斥，也不會去製造恐慌。就像日本三一一，為什麼日本可以那麼冷靜，而相對的事件在台灣就可能沒辦法辦到？因為這就是資訊。當你了解、知道我面對狀況的時候該怎麼處理，你就不會感到害怕。我覺得這可能是讓愛滋病不再污名化，男同志也好、愛滋病病友也好，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被歧視。剛才萬老師講到的，台灣也有發生過，當一個社區發現有一個愛滋病患者住在這邊，可能到最後整家都被迫搬走，因為壓力。所以我覺得這是社運可以想辦法突破的地方，那政府單位我覺得也是一樣，都是因為不了解所以造成歧視跟迫害，謝謝。

與會者：我忍不住想要回應那個同學，承接他的議題。我這一兩年在做博物館研究，我接觸到一些我的好朋友，他們是國中老師跟高中老師，我發現這些老師本身的性別想像或建構都已經受到扭曲了，而他們還在教育下一代的孩子們。所以最近我就在思考，是不是我們的性別教育都是集中在學院式的、菁英式的討論？那些國中或高中老師其實根本沒辦法進入到我們討論的議題裡面。謝謝。

與會者：我之前做過牙醫助理，我剛入工作的時候，我的同事就告訴我，只要你看見病歷上面畫了一個「打勾」、一個「星號」的時候，就要注意病人是B肝，那你就要做好全身的保護措施，就是帶手套、口罩，結束之後要把所有的器具全部消毒一遍。可見得單單B肝這件事情，只是病人自己勾選就受到這麼大的歧視，這才只是看牙醫而已，要是討論到愛滋病要植入卡片，這一定是個更艱難的過程。再來，我有個朋友受到性侵，她就去做愛滋病的檢查，做了

之後，她打去性病防治所問，「怎麼辦，我接下來的路怎麼走」，那個人就說：「可以延長十年到二十年的壽命，我們有雞尾酒療法」，就這樣，她們幾乎是沒有什麼未來的。我必須回應那個男同學的論點，我們從國中、國小就必須要注重這方面的教育，我本身是非本科系的，可是這邊有非常多的專家學者，不管是長輩或者晚輩，我要提醒你們的是，這是一條很漫長的路，必須要跟艱難的走過，而且必須從小去教育，而不是去排斥、否定它，而是要去真正的面對它，因為這是個不會抹滅的問題。

甯應斌（主持人）：不過我也必須要講一句，我覺得訴諸教育是沒什麼用的。因為現在的教育體制裏面，你要這些老師跟學生們講什麼？最開放的不過也就是：「歡愉之餘不要忘了安全套」之類的，甚至這些東西我都很懷疑老師們會講，也懷疑老師會講「同性性愛的時候要怎樣怎樣」，因為這就馬上涉及了同志的性教育。

我看不到我們的教育本身能解決問題，因為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愛滋病跟其他的病有什麼樣的差異？愛滋病跟其他同樣致死的病或者慢性病不能被平等的對待？這個問題的背後就是：我們的社會是否能夠「不要管」別人的性生活，「不要管」別人的性生活是怎麼樣「活」的？個人的性不在道德之內，或者說各種的性在道德上都是同樣正當的，我覺得這才是一個關鍵。愛滋病之所以衍發這麼多問題，其實背後就是同性戀的生活方式，或者主流社會不容忍的其它性生活方式，關鍵問題在這裡。

說到消除愛滋病的污名，其實不用特別去教跟愛滋病相關的事情，只要能講「其實同性戀跟異性戀是一樣好的」、「你有十個伴侶跟一個伴侶都是一樣好的」，能教這些就行了，愛滋病的問題就不用教了。但是問題是，能教這個嗎？如果不能教，那你能教什麼？所以到最後就回到那些不知道要幹什麼的空洞的「尊重」之類的語言，實際上還是換湯不換藥，只是用一些更為細緻、更難讓你去反抗的控制方式。

萬延海：我有一個問題想跟主持人交流一下。我們現在的教育系統、學校可能在愛滋病的教育和性的教育上還沒有準備好，在很多方面還不能做好，但是學校裡的教育總要去發展起來，一些基本的健康的、性的教育在教育系統裡面你早晚都要發展起來。人類很快就會有七十億人口，如果這種知識沒有教育系統來完成的話，也會是一個問題。是不是還是要從一個發展的角度來看，社會也要培養人才，還有一些基本的性教育思想，這樣，性學家也可以發揮社會上影響的作用。因為，沒有教育，要怎麼來處理這些事？

何春蕤：我也想回應「教育」的問題，還有剛才提到「知識透明化」的問題。從前有人會說，很多人對性抱持著保守的、封閉的、排斥的態度是因為出於無知，我現在越來越不覺得那是問題所在。換句話說，真正的問題不是在於「沒有知識」，因為如果真正的問題在於沒有知識，知識不透明化，那你就提供知識，就不會有歧視了。可是問題就恰恰不是這樣，因為歧視不是「知識」的問題，恐怕更主要的是「情感」的問題，是在人格結構上習慣於害怕異己、排

擠異己的一種心態。事實上，我們不是沒有知識，我們已經有了很多現在我們不覺得有問題的知識。因此真正要問的是，知識本身被生產出來是什麼樣子的？什麼樣的知識會被提供？什麼樣的知識會被壓抑？這本來就是一個很政治化的問題。

至於教育那就更不要講了，因為教育本身，特別是剛才提到「體制教育」，那個體制教育的「教育」是幹什麼的？它是在生產什麼樣的主體？國家的政策是在讓教育做什麼樣的事情？今天早上甯應斌也提到，我們因為不是教育裡面主流派的位置，所以特別知道我們的教育常常在採取一些策略去壓抑異類的知識生產，這在教育體制裡看得很清楚。這種的教育體制不會容許像各位想要的那種好像真正很開明的、很透明的知識存在或者流傳；相反的，現在在教育體制裡面已經出來的一些不同的聲音，校內的一些異質的老師，往往都被壓抑。這樣的壓抑維持了教育體制要做的某一種知識、或者意識形態、或者情感、或者信念的再生產，所以要指望體制，還不如去指望、或者去要求、或者用一個運動去推動，讓這個體制必須要容許異類的聲音存在，就好像當年在政治上面去爭取政治異議的聲音可以繼續出來一樣；教育體制也必須要讓性別異類、性異類的種種不一樣觀點能夠說得出來。「能夠說的出來」並不表示我們要列一套政治正確的一整套教材，然後從上到下去頒行，這個我完全沒有指望，因為通常變成了教科書、課程、考試題目以後，教育一點意義都沒有。真正的教育恐怕就是在一些非正式的管道裡面，讓那些已經在冒尖的聲音可以出來，而不要老用刑法235、兒少法、兒福法去對付它，或者用

其他的法條去說「你這個言論危害兒少」等等。

我們在這邊談的，有很多問題不是一下子能夠談得完的。大家覺得今天在會場裡有兩種人，一邊是知識界、學術界裡面的人，一邊是在民間組織裡面的人，我們彼此其實坐落的知識位置不太一樣。我在某個程度上可以想像吳敏倫之所以沒有辦法跟同性戀的隊伍站在一起是因為有什麼其他的一些考量，也確實會有另外一些的用處，他的話語可能會有比較高的客觀性，可能是在群眾面前的說服力會比較強，他可以做另外一種啟蒙的效果，我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但是今天這個場合裏面很有意義的就是，我們如果能夠不要去找尋那個最正確的答案或策略，而是去聽一下在不同位置上面的人其實有哪些觀察和考量，而他今天的敘述裡面又展現出來社會裡面有怎麼樣的一些力量在震盪？他是怎樣去操作這個力量？或者怎麼在這個力量中行走出一個他可以生存、可以繼續說話的方式？我們多多去理解這種不同的關係，也許就比較不會說一定要找到一個比較正確的路線，是兩岸三地都可以使用的。

兩岸三地的環境真的很不一樣，但是寶貴的也是在這個不一樣，因為你會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環境裡面使用不同的招式來達成他們不同的目標。那我在這邊可不可以把那招式轉換一下？我可不可以也學學某個招式，加大我的智庫內容？我可不可以扭轉某個招式，換一個方式來處理？今天我覺得我們在這裡遇到很多不同的議題，意義也在這裡，讓大家都去震盪、去想我還能怎麼轉用而不是去檢驗這個是正確、這個是不正確，反而多去想，我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甯應斌（主持人）：萬延海說要跟我交流，我就回應一分鐘來談一下性教育這個問題。有一些性保守的人卻對於性的議題非常著迷固著、非常想談論性與研究性；也有很多保守基督徒自己有解決不了的性問題，卻往往藉著過度關注與大力譴責別人的性行為來平息自己內心的性衝突。偏偏這些人都對推廣性教育有興趣。還有一些公衛體制的人對於推廣性教育也非常有興趣，但是即使他們推廣的是非常保守的性教育，有時社會體系還不准許他們去做性教育，尤其是他們想要把性教育放到國小、國中的階段。其實我們已經看到過這個狀況，在台灣就有師大晏涵文的例子，他想要把這個模式推廣到大陸去。

不過，我覺得歷史是有種偶然性的，因此我不完全否定教育可以是個戰場。問題是，我們性的自由派也好、激進派也好，有時候沒有辦法進入這個戰場，因為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但是如果那個局勢來了，我們也被迫去介入。介入不見得一定是學生教材，像這次台灣爭議同志友善的性別教育的經驗，教師手冊也是很重要的東西，因為教材可能寫得很保守，可是如果教師手冊裡面有一些比較曖昧的東西，那麼個別教師就可以去發揮，那也可以是爭戰的一個點。但是同志運動應該要有一個認識，就是我們永遠要設立一個較高的標準，例如當保守派攻擊教材或教師手冊時，我們要反擊，不過我們也同時要指出現成教材或教師手冊的不足之處。所以說，我也不是那麼教條地說我們就不要在教育上著力，我不是這個意思，它可以是個戰場，但是就是要有人在那邊打仗。

何春蕤：我覺得我剛才講得有點亂，不夠好，我真正要講的是：歧視不是一種「知識」狀態，歧視是一種「情感」狀態，而這種情感狀態是我們從小到大，在跟人際的互動中，透過人的臉色、表情、人講出來的話、人對彼此的仇恨、人對於自己沒有滿足的狀態的不滿，透過這些而形成的情感累積。這種狀態不是知識的透明化、更加多的知識可以改變的，而需要透過經驗的改變、身體的改變、跟人接觸的改變，透過很多把原來的自我打掉的新做法，歧視才可以淡化消除。所以歧視不是一個很平和的、只要一點新的知識就可以處理掉的狀態。我就希望把這句話講清楚了。歧視不是知識狀態，而是一種情感的狀態，而這種情感的固著因為是包含在你的人格裡，所以是一個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東西。從一個人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已經在日常生活中告訴他要怎麼去歧視別人，然後在教室裡面你再來說「我給你一套教材，我要消除那個情感已經固著的狀態」，這就是很困難很困難，幾乎不可能的。

萬延海：我還是談教育問題。我覺得是這樣的，如果我們放棄了教育、放棄學校的環境，保守派的這些人還是會去推動學校的教育。比如說在中國，法律上有規定要做愛滋病和性的教育，但是很多學校、教育部門也不怎麼做這些教育。但是最近幾年，雲南省的教育廳長很想做改革，所以他在道德教育裡面發展了一個課程，叫「生命、生活、生存教育」，也就是「三生教育」，他把一些健康的部分還有一些性的部分，融到這個教育裡面去。去年夏天，他把美國基督教 Focus on the Family 的一套婚前守貞教育請到了雲南省，對所有學校的老師做系統的培训

。這個「禁慾」教育，比「講究責任、忠貞禁慾、安全套」的教育更厲害，他是完全反對安全套的，是絕對禁慾的教育。這種情況我覺得也是很麻煩的事情，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去面對，因為學校教育這個東西我們不去利用，保守派的人會去利用。

何春蕤：在台灣，學校教育真正的大問題是，就算我們想要進去，這個封閉的校園體制也不會容許我們隨便進去，所以我們偶爾有機會進去時會去放點思想，但是最重要的工作都還是在社會輿論、大眾常識、學術辯論的層次上。

與會者（露德工作人員）：我剛才提到，其實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是，社會的改變其實需要很多的素材，包括機會、平台、資源，甚至包括權力。在這個立場上，一個民間組織不需要這樣的錢去做這麼多的開創？當然需要。一個中心的維持一年需要三百萬，沒有政府的支持，做不下去，絕對倒閉。倒閉以後對社會是否會有更大的幫助？我們不這麼認為。回到黃老師的部分，為什麼我們不去排擠或者不去跟紅絲帶談他們的問題？把精力花在排擠上喔，我想露德的精神會比較多在開創跟延展的部分。謝謝。

甯應斌（主持人）：我知道大家還有很多話說，但是我們已經超過時間蠻多的了，希望明天再見到你們。謝謝大家。